

#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论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择理雅各与辜鸿铭两译本

周天楠<sup>1</sup>, 李春明<sup>2</sup>, 姚小娟<sup>1</sup>

(1. 东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大庆 163318; 2. 肇庆学院 外国语学院, 肇庆 526061)

**摘要:**《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石之作,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在对经典的传承与发展中, 语际翻译至关重要。在全球对“生态”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之下, 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三维”转换方法是生态翻译学中的研究焦点, 即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以及交际维, 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两个英译本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并比较两位译者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双语能力和翻译目的等, 提出二者在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论语》;理雅各;辜鸿铭;“三维”转换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6)03-0214-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3.004

## A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An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

Zhou Tiannan<sup>1</sup>, Li Chunming<sup>2</sup>, Yao Xiaojuan<sup>1</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1, China)

**Abstract:** As a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nalects* contains abundan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s. When ecology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in the world, eco-translatology emerges as required.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focus of eco-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two translators' life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sinology capability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purpose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y adopt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he Analects*; James Legge; Ku Hungming;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收稿日期: 2015-06-29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14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论语》三译本研究”(12542007)

作者简介: 周天楠(1981-),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西文化比较、翻译研究。E-mail: singer8153@163.com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密切关注生存环境与生态文明,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生态思潮。在学术界,许多社会科学学科跻身于理论的前沿,开创了生态批评学、环境语言学、语言演变生态学等诸多生态学研究途径。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生态翻译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以达尔文生态学思想中的生物“适应/选择论”为基础,结合中华文明智慧思想之滥觞,开创了“人本”“中庸”“自然”“尚和”等生态翻译理念。自2004年该理论提出后,引发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潮,近年来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陆续发表。本文即以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观点为依托,对儒家经典《论语》的翻译进行探讨。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言论行事之精华的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及智慧之结晶。自西汉以来,《论语》所教导的孔子思想,迅速渗透到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政治等各个领域,可谓遍一切处,甚至融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标识。故而,“孔子学说与《论语》本书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sup>[1]</sup>。而对经典的传播与发展,语际翻译至关重要。自17世纪以来,《论语》的译本多达几十种,其中颇受世人瞩目且饱受争议的当属19世纪的理雅各(James Legge)和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二者翻译风格迥然不同,理雅各翻译的《论语》为学者风格的著作,因其过于严谨且晦涩的表述而失之于流畅地传达《论语》的深邃思想;而辜鸿铭的译文对《论语》中哲学思辨的把握显然更胜一筹,他行文流畅但缺乏严谨,其略带夸张的翻译手法常为翻译界所诟病。但若以生态翻译学视角来解读两位大家不同的翻译风格,实则是因处于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 一、理雅各、辜鸿铭英译《论语》的“翻译生态环境”概览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的集合体”<sup>[2]</sup>。“由于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思维方式和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翻译理念、审美标准、实践经验等等不同,又由于翻译文本类型、读者需求、接受文化、流通渠道等的差异,这些主客观、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和差异必然会造成‘翻译群落’

主体的不同的适应与选择,他们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整体翻译生态环境,达致平衡。”<sup>[3]</sup>

### (一) 传教士理雅各:架设东西文化的桥梁

著名汉学家理雅各是英国苏格兰人,于1839年受伦敦会派遣到马六甲英华书院任职并负责传教。1843年,理雅各将英华书院迁入香港。期间,他做传教工作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经典,并埋首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工作中。理氏所翻译的代表性作品中,既包括十三经的主体部分,也涉及佛教与道教的一些典籍等。因其对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做出的卓越贡献,“理雅各被称为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之一”<sup>[4]</sup>。理氏译本令东学得以西渐,在西方引发了巨大反响,使众多欧美人士管窥东方文明之时莫不赞叹,谓之稀有。迄今虽逾百年,他的译本仍被奉为中国古代经典翻译的标杆,长期以来吸引了海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的重视,对他的译著评价可谓见仁见智。

从功能主义翻译的“目的论”看,尤其是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与其翻译策略和实际方法有着重要的因果关联。而理雅各的翻译动机主要有二,了解中国,并向中国传教。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对我来说是个伟大的故事,我渴望了解其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形态。”<sup>[4]</sup><sup>152</sup>同时,理雅各试图通过译介经典襄助传教。他认为传教士学习儒家经典是重中之重,他说:“不要以为自己花了太多的工夫去熟悉孔子的著作。只有这样在华传教士方能真正理解他们所要从事的事业。如果他们能避免在孔夫子的基地上横冲直撞,他们就有可能迅速地在人们心中建起耶稣的神殿。”<sup>[4]</sup><sup>153</sup>对于理氏译本,艾约瑟(Dr. Edkins)评论道:“理雅各经过长时间努力而形成的译本里面还是包容了大量可供欧美人士正确认识中国的资料。这里有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有约束学者和贫民心中的准绳和每个人行为举止的规矩。他为传教士和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研习者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sup>[4]</sup><sup>154</sup>因此就翻译生态环境来看,西方学者理雅各的译文与其翻译价值取向达到了适应与选择的平衡。

### (二) 国学大师辜鸿铭:精通中西文化的怪杰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怪人,他出生在东南亚,长在欧洲,却深深地植根在东方的土壤里;他精通几门欧洲语言,获得过13个欧洲大学的学位;他是第一个向西方宣传中华民族的中国人;他

坚信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中华文化能够拯救世界;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却更是一个孤独的人;“批林批孔”之风盛行之时,他逆流而上,宣讲孔孟之道;当人们西装革履之时,他却坚持不剪辫子且穿上了长袍马褂;当国人冷淡他,视他为老古董时,他在国外却被看作东方的圣人;他是托马斯·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这些西方大牌教授的好学生,他还是列夫·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些大文豪的朋友;“他被誉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使节”<sup>[5]54</sup>。此人便是精通中西文化的怪杰辜鸿铭。

在辜鸿铭动笔翻译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的典籍被翻译出来。驱使辜氏进行翻译的一个原因是他对已有的翻译极为不满,甚至批评这些翻译。对于这一点,辜氏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这样做,有着特殊的理由,解释一下我对孔子经典的翻译为什么与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博士的译文完全不同,西方应当极为感谢他,是他第一次为欧洲人完整地翻译了孔子的经典著作,但同时我也必须指出,在我看来,他应对西方世界,至少应对英语世界的人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对于孔子的品格和学说作了生硬的和完全错误的介绍,也正是由于他的作品产生的牢固而持久的影响,人们现在需要克服非常巨大的困难,才能够消除或改变这种情况。”<sup>[5]70</sup>如此,辜氏之所以翻译国学经典是因为他想展现中华文化的瑰宝,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热爱并且坚定地信仰中国传统思想。林语堂先生这样评价辜鸿铭:“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sup>[5]99</sup>因此就其主要的生态翻译环境来看,学贯中西的大师辜鸿铭可谓饱含着文明传承的优良DNA:一是熟谙西方文化,精通西方语言;二是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三是真正掌握了汉语,尤其是文言文。

## 二、“三维转换”方法论指导下对两译本的“事后追惩”

生态翻译学试图打破不同翻译流派的自囿,而对各个学派的理论共识进行整合并衍生了其多样化的翻译手法。其中的“多维”转换理论为其基础翻译理论。而从理论角度来看,语言、文化、交

际一直是翻译家们瞩目的焦点。因而在具体翻译操作中,“三维”转换便成为应用研究的关键所在,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sup>[2]</sup>。但应当注意一点,“翻译生态环境本由多种维度构成,因而当我们为了描述并强调某一维度时并不代表其他维度在翻译过程中没起作用”<sup>[6]237</sup>。即,某点不仅适用于语言维的转换,也许同时适用于文化维与交际维等其他多维度适应选择的情形。自此,如下将从“三维”的角度入手,对理氏、辜氏的《论语》译本进行“事后追惩”。“事后追惩”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指的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处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但于译事完毕后对译者的译文做出评价与选择。即,“译事之后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所遵循的‘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法则对译者的选择做出再次选择和仲裁”<sup>[2]</sup>。

### (一) 语言维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sup>[2]</sup>语言翻译主要注重译文与原文转换的层面、形式和语境上。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口语语体特点显著。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时刻把握原文的口语特点。”<sup>[7]</sup>辜鸿铭译文亲切、自然,尤其注意说话人语气与上下文衔接,使《论语》的对话体语言很好地再现出来。辜氏尤其善于通过调整、增加适当的字词实现上下文的连贯,他的译文读起来生动有趣,没有任何枯燥乏味的感觉。如《学而:十五》的翻译。

**原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辜鸿铭译文**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I understand,” answered the disciple, “We must cut, we must file, Must chisel and grind. That

is what you mean, is it not?"

"My friend," replied Confucius, "now I can begin to speak of poetry to you. I see you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the moral."

不难看出,辜鸿铭通过一系列的修辞策略实现了上下文的完美连贯。首先,辜氏使用了英文中常见的把部分对话置于说话主体之前的句式,使二人对话显得地道而自然;其次,辜氏分别在第二个“子贡曰”和“子曰”的内容里画龙点睛般地增加了“I understand”和“My friend”两个小词,并将“其斯之谓与”译成反意问句“is it not?”。这几处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动使之前语气平平的问答突然间有了生气,读者仿佛就站在子贡和孔子身旁,亲耳谛听他们的对话一般。下面,不妨将理雅各的同一章译文相比较。

**理雅各译文** Tsze-kung said, "What do you pronounce concerning the poor man who yet does not flatter, and the rich man who is not proud?" The Master replied, "They will do; but they are not equal to him, who, though poor, is yet cheerful, and to him, who, though rich, loves the rules of propriety."

Tsze-kung replied, "It is said in the *Book of Poetry*, 'As you cut and then file, as you carve and then polish.' The meaning is the same, I apprehend, as that which you have just expressed."

The master said, "With one like Ts' ze, I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the odes. I told him one point, and he knew its proper sequence."

无可指摘,理氏准确地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从这一小章内容便可发现,理氏译文严谨的书面措辞特征,甚至将“例如”二字译作“What do you pronounce concerning…”显得非常正式,无法体现师徒间亲密随和的对话语气。在翻译“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两小句时,理氏连用两个who,然后停顿,再插入though,使整个句子完全失去了生机,显得刻板僵化,读来味同嚼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章最后一节“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理氏选择第三人称代词him,转为孔子向他人转述他对子贡的评价,而不再是师生间的现场对答。可见,理氏对原文的对话体语气的传达远逊于辜氏独特而生动的译文。

在实际翻译中,理氏务求精准传达经文的含义,

因此他选择直译,尽可能与原文的行文和句式相一致,有时甚至是逐字翻译。但另一方面,这种翻译方法自然而然会使译文显得用词别扭、结构生硬、句子冗长,甚或偏离和曲解了原文的意思。如《子路:三》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理译为“When punishments are not properly awarded, the people do not know how to move hand or foot”。在此“无措手足”应是“不能明辨是非,不知如何行动”的意思,可理氏却直译成“do not know how to move hand or foot”(不知道如何移动手和足),即是直译过度所致。同样的地方,辜氏的译文却是“the people will be at a loss to know what to do”,可谓简洁恰当。但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古汉语和英语的巨大差异,译者必然要在原文含蓄多义的字、词、句、章中做出一种选择,所以任何高明的译者都无法避免误解的出现。大体来看,理氏的译本在经句意义传达上还是比较准确的,虽有误解和误译,但瑕不掩瑜,这也是理氏译本半个世纪以来仍然为世人拜读的根本原因所在。

## (二) 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意即:“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释义。应充分意识到源语和译语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文化差异,从而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语。与此同时,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时,亦应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归属的整个文化体系。”<sup>[2]</sup>总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具有文化意识,并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竭力保护源语与译语的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为了使欧美人士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夏商两代,辜鸿铭在注释中作如是说:“夏朝(公元前2205至前1818年)之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犹如古希腊之于当今的欧洲人;同理,殷朝(公元前1766至前1154年)则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时代。”<sup>[8]96</sup>可以说,辜氏这一“以西喻中”的方法极大地适应了译语文化所属的文化体系。但辜氏的译文同样存在许多误读和误译的问题。如《八佾:二》:“三家者以《雍》彻”中之“三家”乃指鲁国季、孙、孟三诸侯,非指“季氏”一家。辜氏将本章第一句中“季氏”译为“The head of a powerful family of nobles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孔子之国一权势显赫的大家族之首脑),按其一贯的归化译法似乎也可接受,但他紧接着将下文第二章中出现的“三家

者”译成“The members of the same powerful family”，意指“同一家族（季氏家族）的成员”，则让人难以接受。

语言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孔子因人而异的施教方式等诸多因素导致《论语》小部分章节意义难以确定。理雅各在面对这些疑难章节时首先采取承认的态度，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提供详尽的注释，便于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如《公冶长：七》：“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此章最难解的地方是孔子评价子路的“无所取材”几个字。理氏把此句答话译成“He do not exercise his judgment upon matters”，意为“他（子路）遇事不用心思考、仔细裁度”。然后，理氏在译文注释中指出：“‘无所取材’乃难解之处，朱熹释‘材’为‘裁’，‘裁度事理’之意，故有此译。郑玄保持‘材’的本义，解此节为‘无所取于桴材’。还有一位古代注家把‘材’等同与‘哉’字，在‘好勇’后停顿，于是此节就成了‘子路好勇，不能超越自己懂得我的真意’。”<sup>[8]126</sup>可见，理氏对疑难章节采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和谦逊的，他至少对宋代之前的主要注疏了然于胸。自己虽选择了朱熹的解读，仍然把不同的意见列举出来，给读者以选择思考的空间。相比较理氏出色的注释，辜氏则选择注重儒家思想之所谓有机整体性，忽略文字细节之辨析，他的注释相对少得多，但这在客观上便无法为疑难章句的含义提供争辩的余地。

### （三）交际维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而这种转换对译者的要求，除将语言信息及文化内涵进行转换与传递之外，还需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置于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体现出来”<sup>[2]</sup>。交际维与语言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译语表达形式上。语言翻译倾向双语形式相近。而“交际翻译则要求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使译文流畅、地道、易懂，从而能强调信息产生的效果”<sup>[9]</sup>。

早在19世纪初，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施耐尔马赫（Schleiermacher）曾讨论过翻译的途径，他认为：“译者把一部作品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有责任帮助译本的读者在不脱离自身语境的情况下理解作品。”<sup>[8]196</sup>

理雅各的风格是学者式的，他的译文希望能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因此他选用异化方法，对书中所涉大量人名及专有名称等采取音译形式，比如：“孔子的弟子名字，他一律采用音译形式；其他的还有白圭（Baigui）、君夫人（Junfuren）、小童（Xiao-tong）”<sup>[10]</sup>；再如“《八佾篇》中的《韶》与《武》直译为‘shao’和‘wu’，这两种中国古代的舞乐直译出来让英语读者不知所云，译为music of shao和music of wu更好理解”<sup>[11]</sup>。他的翻译风格由于不自然而受到辜鸿铭的讽刺。辜氏曾借英国汉学家巴尔福之口道出了自己的不屑：“翻译这些经典，大量依靠的是译者所生造的专业术语。当前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运用的术语是粗糙、拙劣、不充分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符合语言习惯的。”<sup>[12]</sup>

相比较，在辜鸿铭看来，为使读者专注于孔子及其弟子所讨论的问题，那些烦琐的人名与地名不如略去。因此，除孔子及孔门重要的弟子颜回和子路外，辜氏在译文中几乎略掉所有的人名。大凡弟子都一概用“一个弟子”（a disciple）命名。至于书中各诸侯国之名，辜氏大体采取“某国”（a certain state）、“外国”（a foreign state）一语带过。此外，在一些术语的处理上，辜氏尽量选择英文读者熟悉的词汇，如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中，《诗》之名为“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即是一例。辜氏在此选择三个英文字表达诗经中体裁之丰富，其中的Ballads是英国文学中的诗歌体裁，而Psalms则出自基督教的《圣经》。这种译法虽显累赘，却能令英语读者快速产生熟悉和认同感。但需要指出的是，辜氏一心要选择英语中固有的术语来翻译儒家学说中一些特有的概念，译文有时难免牵强附会，甚至相去甚远。比如，辜氏译《子罕：一》中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Confucius in his conversation seldom spoke of interests, of religion or of morality”。在此，辜氏选择将“命”与“仁”这两个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简单译为“宗教”（religion）和“道德”（morality），显然失之偏颇。这与辜氏翻译《论语》的目的和原则有关系。辜氏为了使译文流畅可读，从西方的哲学、道德、宗教视角出发，借用西方人熟悉的名称，其初衷固然很好，但这种策略运用过多，也会导致文化趋同性，从而遮盖了儒经特有的含义。

### 三、结束语

从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理雅各和辜鸿铭的翻译风格,可以看出,译本作为翻译之成品的实际状态与译者各自的翻译动机和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所采取的原则和方法是为了实现向传教士和西方学者介绍儒经的目的。首先,理氏的译本博学且严谨,为“学术型”译作的表率。其次,为了尽量保持原作的意义,在翻译手法上,理氏多采用直译。尽管理氏译本中存在过分拘泥于原文文字,或对原文理解不够准确的情况,但值得肯定的是,理氏对绝大多数章节的文字翻译是准确的。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在疑难的地方援引多位古圣先贤的不同见解供读者参考。因此,从理氏翻译儒经是为了让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理氏的译本迄今仍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教材。

辜鸿铭视《论语》为蕴涵丰富哲学思想的经典文学作品,本着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传道的总体原则,从整体视角出发,运用高度“归化”的翻译策略,注重传达原作的文风与神韵,语言流畅地道,俨然一部文采飞扬的文学作品。尽管辜鸿铭受制于其“归化”的翻译策略,译本中偶尔词不达意,但整体上辜氏的翻译在很多地方显得比理氏及此前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理解要高出一筹,并且纠正了理雅各译本中诸多误解之处。尤为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辜氏通过语言手段微妙地再现了原文生动的对话,他的译本展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改善了理氏译本枯燥乏味、了无生气的情形。应该说,这在向西方读者传达儒经精神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辜氏的旁征博引不仅让西方人见识到中国人对西方思想哲学的了解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同样拥有优秀的传统和深刻的思想。

当然,翻译过程中的转换绝非仅限于此三维,而是在多维转换中以此三维最重。此三维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从逻辑的角度看来,“翻译是语言

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交际的积淀,故而语言、文化、交际有着内在的、符合逻辑的关联”<sup>[6]236</sup>。因此,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语言、文化、交际等各因素往往相互交织,难分难解。此外,为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考量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对翻译方法有不同的处理调整方式,这是客观事实。譬如大自然中生物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同样,“不同的翻译文本的‘共生共存’应该成为翻译学发展的一种常态”<sup>[9]</sup>。经过时间的洗礼,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发展进化,汰弱留强。

#### 参考文献:

- [1] 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卷)[M].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4.
- [2]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 [3]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4):62-67.
- [4]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5] 王荣华.四方步 六人行:国学大师的故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 [6]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7] 赵鹏.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典籍翻译——以《论语》翻译为例[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2):120-122.
- [8] 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 [9]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不同翻译研究途径的比较研究并兼答相关疑问[J].中国外语,2014(5):104-111.
- [10] 刘阳春.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4):66-69.
- [11] 张小波.关于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14(4):37-40.
- [12]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李晨曦,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2.

(编辑:朱渭波)